

# 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内生路径研究: 基于村庄传统文化整合视角

汪国华<sup>1</sup>,杨安邦<sup>2</sup>

(1.常州大学瞿秋白政府管理学院,江苏常州 213159;2.中水淮河规划设计研究有限公司,安徽合肥 230601)

**摘要:**面对日益被污染的农村,诸多污染治理措施显得力量单薄且系统性弱。以皖南村庄环境污染治理为例,通过持续跟踪研究,对比污染治理前后的境况,以期找到污染治理的内在逻辑和治理系统。在政府引导性理念发展乡村经济的过程中,环境污染治理产生外在应变系统,但不具有可持续性和有效性。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理念与外在应变系统间的稳固链接,需要激活内在支撑系统和互联互通系统这两大结构黑箱,同时,村庄的宗祠、宗族、民俗与村落文化等传统文化力量在内在支撑系统、互联互通系统和外在应变系统中起着枢纽性功能,如此一来,农村环境污染治理便成了村民集体性事务,村民形成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经过传统文化渗入、链接、激活和激发,确立了村庄环境污染有效治理的内生路径。

**关键词:**村庄文化整合;污染治理;结构黑箱;内生路径

**中图分类号:**X3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20)04-0091-06

## 一、研究的转向:传统文化渗入农村环境 污染治理

农村环境污染的预防与治理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焦点和难点,一方面是农村污染的类型复杂,有面源和点源共生的特点;另一方面是我国工业处于转型与转移的过程中,农村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接纳污染企业的重任。此外,污染治理的主体缺乏配合是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面对全球“环境不平等”和

我国城市工业污染向农村转移,“绿与非绿”的二元社会结构将对农村环境造成更大压力<sup>[1]</sup>,已有研究包括如下几点:

其一,农村环境污染产生原因。如何说明环境问题与社会制度、结构等因素有因果关系是环境问题研究的难点<sup>[2]</sup>。中国特定二元社会结构的存在和作用<sup>[3]</sup>、知识和权力转移<sup>[4]</sup>是导致农村环境问题的原因。随着经济发展,农村工业污染产生原因更加多元:农村优先发展重化工业的工业化模式与工

收稿日期:2019-11-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8BSH067);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AHSKQ2014D80)

作者简介:汪国华(1977—),男,安徽东至人,教授,博士后,从事环境社会学与流动人口研究。

业三废对农业环境的整体蔓延<sup>[5]</sup>,农业生产要素使用<sup>[6]</sup>,尤其是高毒农药使用<sup>[7]</sup>,农村城镇化或人口集中<sup>[8]</sup>和农民环境意识淡薄<sup>[9]</sup>等,均对农村环境产生污染。此外,地方政府与企业形成的利益共同体是农村工业污染产生的制度原因<sup>[10]</sup>。质言之,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农村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除了主导的经济原因,“社会”的缺席也是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之一<sup>[11]</sup>。基于此,笔者尝试从村庄传统文化与地方政府结合的角度,寻找农村环境污染治理逻辑。

其二,农村环境治理模式。第一种为政府主导的环境治理模式,即环境治理过程中,政府负首要责任<sup>[12]</sup>,政府的作用一定是主导性的<sup>[13]</sup>,即便环境污染出现复合型治理的特征,政府管制<sup>[14]</sup>、引导市场调节等功能仍是首要的。第二种为探寻中的社会制衡型模式,目前这种模式只是一种政策期待。实现从“政府直接控制型”迈向“社会制衡型”环境政策转变代表着环境善治的雏形<sup>[15]</sup>,与此同时,社区合作机制、激励机制等在农村环境治理中亦具有积极作用<sup>[16]</sup>,农村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实施治理<sup>[17]</sup>为村民自主治理农村环境提供了探索性路径<sup>[18]</sup>。概言之,从单向度重视国家和技术到多向度重视国家—社会、技术测量—民众感受,“民标”是农村环境治理的新转向<sup>[19]</sup>。

关于农村污染治理,已有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开始从工业化、政治体制转向社会文化、社会制度对污染原因和困境进行探讨,从行政权力和利益共谋结合转向社会参与治理的尝试性研究,但是没有与政府主导模式实现接续。如何从政府与村庄力量互相联结、农村独有的社会文化与社会结构背景的角度探讨农村污染治理困境和治理转向,成为中国农村现代化建设过程的应有之义。

## 二、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系统性措施

以安徽省南部的 S 乡为个案进行深度剖析。该乡地处皖东南,群山环绕,土地面积 121.8 平方千米,约 2.1 万人,绝大部分村民居住在两山之间的平地,平地上人口密度非常大。住户房屋大多数共用一堵墙,两排住户间道路以青石板铺成,无法通过一辆汽车。在工业化日渐推进的形势下,该村与全国其他村庄一样,使用塑料、农药、化肥等现代工业产品日趋增多,同时,从城市转移而来的企业也不断增多。在地域狭小、人口众多和工业化产品加速使用

的背景下,20 世纪 90 年代到 2013 年,村庄的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村内经山上溪水而形成的内河中,塑料和生活垃圾成堆,这些垃圾最后都流向了新安江,给饮用水源造成了重大污染。与此同时,企业不达标排放也是重要污染之一。基于此,省市县政府高度重视,在政策的驱动下,村庄经历了数年的环境污染治理,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治理措施。

第一,环境治理想法的由来。污染治理仅是村落保护、文化遗产和经济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同样地,从该乡污染治理的全过程来观察,污染治理只是古村落保护、传承与创新的一部分。由于该乡隶属于徽州古文化村落,其污染治理便与一般村落有明显差异。村庄的主要事务除了乡政府投票决议外,还需要参考 H 氏各分支长辈建议。由于 H 氏宗祠还有许多的支祠,如慈寿堂、孝友堂、善庆堂、华德堂、仁本堂、积善堂等,他们将村庄的诸多居民联系在了一起。宗祠是不同姓氏村民集中讨论和重要活动的场所,乡政府在核心事务治理上需与 H 氏等达成共识。

第二,环境污染治理的整体规划:系统与联动治理。首先,山与水治理结合。该乡山与水是共生共通的,对于环境的净化起到了绝对的主导作用,因此,山水共同保护与治理成为该乡污染治理的策略之一。其次,外河新安江与内河共治。由于该乡的水源较为缺乏,主要依靠山上流下的雨水和村内的井水,一旦水源被破坏,则整个供水系统会出现紊乱。所以,该乡需要全力保护好水源,这便需要对源头和流向的河流进行双重保护。由于河流会出现季节性的返流,一旦新安江被污染,该乡的大河小河无一幸免,为此,地方政府制定了计划,努力不让该乡河流的工业污染和生活垃圾流向新安江,实施内河和外河的共治。

第三,街道与村道联动治理。由于省道经过该乡的大部分村庄,街道的环境污染治理便具有很强的公共事务特点,加之长期大量流动人口带来的污染,街道治理成为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解决的困扰。与此同时,村道污染治理也具有同样特点,基于街道与村道相通、两者治理属性类似,乡村实施街道和村道联动治理。

第四,山水治理与村落保护协调一致。此乡原本的环境非常优质,由于生活垃圾和污染企业的影响,导致了乡村内街道一度垃圾成堆,生活污水和塑料垃圾堵塞河流。乡政府首先从村民日常居住的古

村落着手,因为古村落持续存在需要对污染长期治理,村民对山水污染治理有了很强的认可。政府便将山水治理与村落保护放在同一个框架下进行。

第五,文化生态与村落保护并举,带动旅游和经济发展。该乡是徽州文化比较明显的乡村,从村庄的建筑风格到公共空间陈设均能体现:乡村内有大量的明清古建筑,有些是省级或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木质结构的阳雕或阴雕都非常传神,表达出那个时代的精神寄托和心灵神往;乡村内的道路绝大部分以当年徽商捐赠的整块青石板为主,道路两边配有大量寓意深刻的石雕。地方政府规定,以徽派建筑风格进行旧房改造的居户,每户可以得到最低6 000元的奖励。以生态文化与古村落保护为其立乡之本,环境污染的治理在此理念的统领下进行。

### 三、传统文化渗入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具体呈现

首先,乡村污染治理经费需要有可持续的来源。资金来源依靠政府财政拨款和宗族、村民的捐赠。财政拨款是目前村庄建设费用的基本来源,该乡也同样如此。不过,乡里会拿出专款用于村庄污染治理,包括村庄河道修理、垃圾清扫人员工资、迁坟补偿、村庄美化、古村落保护等。该乡的H氏宗祠年代久远,明代初年宗祠和嘉靖年间宗祠一直在延续。村庄的孩子只要出生,长辈便到祠堂进行捐赠,从500元到数万元不等,孩子的名字被镌刻在祠堂里的大石碑上。同时,外出经商、读书或务工等精英也会自愿捐赠,往往数额较大。钱财由祠堂内部的工作人员保管,如用于治理污染时,就需要由宗族的长辈与村委会共同协商讨论,就污染治理的名目、数额、效果和后续的持续捐赠等达成共识。为避免资金被挪用和有效地用于污染治理及村庄建设,资金实行管用分离的原则,并在年终宗祠庆典上公布使用明细。这样,就确保了乡村污染治理资金的持续供给。

其次,村民有序、义务地参与村庄内河道治理。内河的治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治理污染和保护古村落、古民居和故居等,经过动员,村民有序、义务地参与。内河从后山起源,流经村内几乎所有的村内道路。在未治理之前,村民所有的日常生活垃圾被直接倒入河内,经历宗族、村委会动员和自我积极认同之后,在村委会统一安排之下,村民每月会抽两天的时间,即月头和月中集中清理河内垃圾。首先,

将最上游的闸关上,同时将每间隔一段的闸关上,通往新安江的最后一道闸也同时关闭;其次,每次每户派一人,自带工具到河内清扫垃圾,包括固体垃圾、沉淀在河里的微生物垃圾等,全部打扫到闸门口;最后,统一收工,上游统一提闸放水,将所有的垃圾冲到最后一道闸,进而被这道闸挡住,村民再一起把所有的垃圾打捞起来放入垃圾筒。如此循环清理,村落内河清澈见底,鱼虾等成群出现,鸭舌条等水生植物也长势良好,河流的生物系统得到良性恢复,下游的新安江也避免了被污染,河流的共生系统逐渐达到优质状态。此外,每年在民俗表演时,会将村民参与河道治理过程编成唱词,激励村民来年继续踊跃参加。

再次,制度性地实施街道与村道治理,让村民有规则倾倒垃圾,并有偿请人清理打扫道路垃圾。根据各村自愿报名和困难帮扶的原则,每个村招募若干有偿道路清洁工,轮流值班清扫垃圾和倾倒垃圾。收集起来的垃圾由乡里统一派运输车运到指定的地点掩埋或焚烧等。同时,为避免垃圾乱扔,乡政府组织宣传,挨家挨户散发垃圾倾倒规则,避免垃圾被扔到道路上或者河流里。由于该乡H姓居众,宗族的诸多成员也参与到宣传中,并带头执行倾倒规则。通过规则的内化,村民形成了一种理念,即街道如家一般,需要自己亲力亲为做好,污染治理成为村民一项重要的公共事务。

第四,山头统一管理 with 分户经营有机结合。乡村一直流行土葬,坟墓主要是自家经营的山林,如此一来,山头的植物种植无法实现规模化,更为严重的是,很多高大乔木和竹林会因为选做墓地而被砍伐,造成水土流失和环境自净化能力减弱。基于此,村委会统一划出公共林地供村民土葬之用,至于事先已经选好墓地的村民则动员他们迁移墓地。该乡风俗是人未死先选定墓地并修建空坟,由此造成诸多山林被破坏,在村委会无法协调的情况下,请乡里有名望的元老进行上门调解,开始村民还是比较坚持空坟不迁的。随着生态旅游推行、元老劝解和古村落保护推进,很多村民的空坟都迁至统一规划的山林,这样有利于在村民自主经营的基础之上实现统一管理,有效地保护山林、植被和山体等。村民自营山林也在政府统一的包销之下,种植山核桃、枣树、竹林、茶叶和菊花等。

最后,村民和地方政府为保护传统村落,共同抵

制外来污染企业进入。2011年,该乡村民因在乡内一家化工厂工作而离奇死亡,进而又发现河里漂浮大量死鱼,村民怀疑河水受污染,沿途村民被迫搬迁,古民居无人照管。化工公司声称该项目县乡均已审批通过,于当年投产生产。事实上,审批意见只是“原则上同意项目建设”,且要求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做好相应工作,针对生产生活废水规定必须经污水处理设施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才能外排入河流。经此事件,乡政府和村民均认为这家企业对水源和村民健康造成重大不良影响,对当地传统村落带来巨大的破坏。对于再次入驻的污染企业,乡政府和村民是一致反对的。

综上所述,S乡的村庄传统文化已经渗入环境治理的诸多层面:村委与宗族动员之后村民有序参与河道治理,并通过传统民俗加以宣传;村委制度性管理与宗族动员的村道治理;村委规划与宗族协调的山林治理;村庄集体为了保护传统村落反对外来污染企业。从资金供给,到日常污染治理,再到抑制外来污染,宗族、民俗、古村落等传统文化均渗入其中,有效地参与治理。

#### 四、基于传统村庄文化整合的 环境污染治理系统

由于该乡的地理文化条件特殊,群山绕乡、河流横穿、可耕地极少、山林众多,徽派文化遗迹较多,在单纯且分散种植山林经济作物时期,乡村并未形成富裕的生活局面,没有获得持续的经济来源。徽州的传统学术文化既有一以贯之的学脉,又有各个时期的特色<sup>[20]</sup>。基于此,乡政府利用独特的地理文化条件,从村庄保护和传统文化建设角度,走出自身特色的道路,这亦是村庄环境污染治理的引导性理念。

引导性理念需要由宗族配合才能具体实施,宗族与宗祠等传统文化的功能有:其一,接受捐赠,救济功能。宗祠在村民心目中的地位比较神圣,每逢重大节庆日都会在祠堂内举办大型的聚会和祈福活动,村民几乎都会参与,形成了强烈的集体参与意识和集体认同感。在此背景下,捐赠钱款给宗祠就成为一种非常荣耀的事。同时,捐赠的钱会公开地用于各种公共事务,包括乡村的环境污染治理。其二,婚丧嫁娶,团结功能。乡村里的红白喜事都会安排在祠堂里完成,各家成员轮流去帮忙,同时在祠堂里可以吃3天。这种方式加强了村民间的沟通与交流,有利于在重大事务上的讨论与协商,宗祠的团结

功能非常显著。其三,安排事务,统筹协调。捐赠钱款会以现金的方式交给专门看护宗祠的人员管理,使用则由宗族各支祠长辈协商,给出建议并共同定夺。尤其是村庄污染治理,支祠长辈非常认同,不仅出谋划策,还和村委会讨论,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会去村道、街道、省道和河流等地方亲自去监督和参与,以期获得满意的治理效果。其四,举办活动,文化传承。宗祠会举办各类有特色的活动,购买各种民俗器具,安排活动,挑选演员等。同时,在村民和宗族长辈共同讨论下,选取了具有典型地方特色的活动进行宣传。具有浓郁乡村语言特色、祈求国泰民安的“打秋千”,祈福辟邪的“叠罗汉”等,这些活动有力地传承了徽州地区传统民俗文化。

宗族与宗祠等传统文化的救济、团结、协调、传承四大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治理内在支撑系统。救济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让村民形成了以宗祠和宗族为核心的强大信任力,形成村民间的互相团结。当面对各类复杂事务时,宗族便有了弹性的协调功能,如此一来,为宗祠的文化遗产功能进一步强化打开了空间,可以在村民协商与讨论的基础上更好地选择文化遗产的项目与具体实施过程,村民与宗族间的交流体系便建立起来。超出家庭的宗族或村庄认同,可以降低农民合作的成本,有效地解决村庄的公共事务<sup>[21]</sup>。宗祠是村民集体精神象征与映射,在宗族集体主义和公共精神的引导下,为村庄环境治理的开展奠定了秩序性前提。

宗族与村委的互联互通系统,确立双方权责边界。乡政府是国家基层行政机关,负责经济和行政工作中重大问题的决策,乡政府的很多成员都是宗祠家族的成员,他们一方面需要承担乡村管理的重要职责,另一方面又需要协调与各支族的关系,以方便工作顺利开展。宗族长辈协助管理村庄的功能需要在村委的有力支持下才能完成,这种有力支持包括环境污染治理理念的提出、环境污染治理项目的确立、污染治理程序的安排、污染治理经费的获取等,宗族核心成员则围绕这些方案进行有针对性地补充和调节,共同治理污染。当然,宗族骨干无法干预乡政府的决策和工作,只是在如何动员村民的问题上进行协调讨论,努力达成一致。

乡村环境污染治理形成了较好的外在应变系统,对于突发性自然破坏、长期性生活垃圾、废水、企业排污等环境污染治理起到了很好的治理效果。首先,资金的双渠道来源。通过村民捐赠和财政拨款,

使得乡村污染治理有了持续的资金双渠道供给;其次,突发事件应变,村委会和以宗族为首的村民力量对于外来污染企业的抵制;最后,文化持续传承,对诸多故居和民居的保护与修缮,获得村民和宗族的认同,对故居、文物等进行长期跟踪性保护,不仅获得村民认同,同时也传播了徽州文化,彰显了乡村引领性发展理念,诠释了文化传播与经济发展互促的观念。基于上述乡村环境治理过程和参与主体的系统构建,形成了如下的逻辑构图(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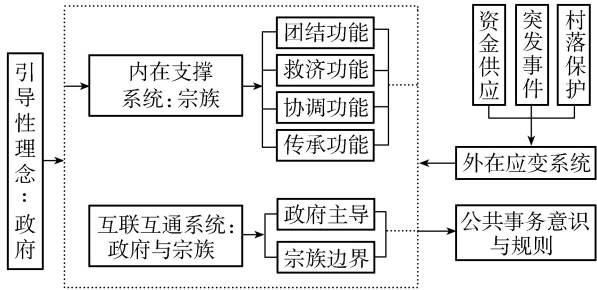


图1 乡村环境污染治理内生路径生成逻辑

图1从表象上揭示出,在政府引导性理念发展乡村经济的过程中,进行环境污染治理直接对应的就是资金供应、突发事件处理等这些应变系统的产生,但是,这种单一存在的外在应变系统,不具有可持续性和有效性,因为其无法形成长期性的政府与村民之间的合作机制。

图1蕴含的深层次机理在于,政府与外在应变系统间的转化功能,即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理念与外在应变系统间的稳固链接,需要激活两大结构黑箱——内在支撑系统与互联互通系统。结构黑箱是指农村环境治理中的宗族结构、政府与宗族结构,这两个结构在污染治理中形成的系统处于未被发现的黑箱状态,内在支撑系统有利于村民形成集体认同和村庄文化认同,会形成村庄污染治理的内在支撑系统;互联互通系统有利于地方政府与宗族的良性合作,后者会形成互联互通系统。

图1表达的更为重要的信息是:村落的传统文化力量在内在支撑系统、互联互通系统和外在应变系统中起着枢纽功能;由于宗祠和宗族有着文化传承功能,而文化传承是需要有具象实物、仪式和抽象精神等内容,这些内容的长期有效存在,使得宗族的功能发挥有很大的空间。与地方政府沟通中,宗族确立了自己比较合理的定位。在外在应变系统中,传统村落的保护越来越受到上自国家、下至基层政府的重视,无论是故居、村庄,还是遗迹,都被列入保

护对象,使得环境治理的外在应变系统有了较为可靠的村民基础。

村庄传统文化在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具有整合功能。传统文化即宗族、宗祠、传统民俗文化和村落文化等,形成了村民积极的社会认同,而认同是确定群体符号边界、实现内群体向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确立群体内向的合法性的必要条件<sup>[22]</sup>。进而,村民逐渐将环境污染治理由外生事务变成自己事务,从而有效避免个别村民“搭便车”现象,共同去进行公共产品的建设与维护<sup>[23]</sup>,成为村民群体环境治理的非正式制度,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正式制度形成了高度契合。传统文化在不同村庄、村庄与地方政府、外在突发环境事件之间形成了顺畅的联通,环境治理内生路径渐渐明晰。

该村庄的环境治理内生路径凸显在3个层面:其一,该村庄所具有独特的传统文化资源是内生于村庄的。较单一姓氏的宗族、宗祠、悠久独特民俗和古村落等,从村庄内部产生且为村庄发展贡献力量,与社庄不同阶层形成了长期的融合。其二,环境治理脉络的形成是村庄内生的。村庄传统文化与地方政府积极发展策略契合,激活了农村环境治理的不同系统,形成了链接。其三,最终产生村民集体参与环境治理这一路径,顺理成章是内生的,它源于村庄传统文化有效地渗入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并且传统文化仍在延续与更新。

## 五、余论: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内生路径的探究

乡村环境污染治理效果明显,其中需要彰显的地方在于:其一,政府引导性理念。政府对于农村发展定位极度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村庄未来数年乃至数十年的走向。其二,克服了政府与宗族互联互通系统的瓶颈。村委会与宗族在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共同意识非常有利于污染资金获得、日常治理、抵制污染和持续治理,在农村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政府战略及地方特殊群体如宗族力量之间得到了很好的平衡。宗族的组织形式、宗族的祠堂、宗族的谱牒和宗族的内在机制,都可以通过自我调整,逐步地与社会现代化进程契合<sup>[24]</sup>。其三,政府与地方特殊群体能形成集体认同。即对传统乡村文化的认同、继承与传播,这也是未来中国诸多乡村值得借鉴的地方,这种契合点的寻找有利于政府与村民对环境污染的共治。

学界不断地探讨环境污染治理的方略,构建了

“严格法治”“引导激励”“多方参与”三大环境政策及“体制机制”“技术和产业”两大支撑体系的“3+2”国外生态环境保护经验理论体系,以此理论为基础,对国外生态环境保护经验进行总结和提炼,旨在有效处理当前社会发展失衡、生态环境治理困境等前进中的问题<sup>[25]</sup>。然而,有一点必须明确,中国农村环境污染发生在农村社会结构和文化土壤之中,有别于国外乃至中国城市环境污染发生、发展、治理,农村污染企业通过融入大共同体与建构差序格局两大策略互构为共生系统,使得农村点源污染治理困境丛生<sup>[26]</sup>。如何破除政府与企业的内在关联,形成政府与村民、企业的三方互通合作,这种路径的选择就需要考量中国乡村社会特有文化社会结构背景,寻找村庄特有、被三方认同且能带来持续经济效益的结合点,这才是社会永续发展的基石。村民自治组织、新兴社会组织等在某些地区成为环境治理的一种选择,这种自治组织有3点值得讨论:非内生性问题,它是村民为环境问题自愿成立的临时性组织,并非与村庄一直相伴而生的;融洽性问题,其组织目标难以与地方政府经济发展政策贴合;后续性问题,由于其成员目标单一性和联系纽带的非内生性因素,其发展后劲微弱。

村庄的传统文化资源是内生于村庄的,且一直延续存在,不仅包括有益的宗族资源,同时还有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各类文化资源,既能带动村庄的经济发展,实现地方政府与村民的增富,又能以创造经济收益的举措实现环境美好和环境污染治理,更能规避农村污染复发的潜在风险。现代村庄管理与传统文化力量彰显使得村庄团结动力和集体认同增强,开辟了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独特路径。

## 参考文献:

- [1] 洪大用. 复合型环境治理的中国道路[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6, 20(3): 67-73.
- [2] 吕涛. 环境社会学研究综述——对环境社会学学科定位.
- [3] 洪大用. 中国民间环保力量的成长[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4] 王晓毅. 沦为附庸的乡村与环境恶化[J]. 学海, 2010(2): 60-62.
- [5] 唐旭斌. 新中国成立30年来农村环境的污染与治理[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13(3): 64-69.
- [6] 周力. 产业集聚、环境规制与畜禽养殖半污染源污染[J]. 中国农村经济, 2011(2): 60-73.

- [7] 张云华, 马九杰, 孔祥智, 等. 农户采用无公害和绿色农药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对山西、陕西和山东15县(市)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04(1): 41-49.
- [8] 黄季焜, 刘莹. 农村环境污染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来自全国百村的实证分析[J]. 管理学报, 2010, 7(11): 1725-1729.
- [9] 陈阿江. 农业面源污染研究策略[J].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7(6): 8-18.
- [10] 张玉林. 农村环境: 系统性伤害与碎片化治理[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6(2): 9-12.
- [11] 荀丽丽, 包智明. 政府动员型环境政策及其地方实践——关于内蒙古S旗生态移民的社会学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2007(5): 114-128.
- [12] 张晓. 中国环境安全评论(第一卷)[M].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4.
- [13] 周晓虹. 国家、市场与社会: 秦淮河污染治理的多维动因[J]. 社会学研究, 2008(1): 143-164.
- [14] 王晓毅. 农村发展进程中的环境问题[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4(2): 58-65.
- [15] 夏光. 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 理论与机制研究[M].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0.
- [16] 陶传进. 环境治理: 以社区为基础[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 [17] 王芳. 西方环境运动及主要环保团体的行动策略研究[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2): 10-16.
- [18] 雷玉琼, 朱寅茸. 中国农村环境的自主治理路径研究——以湖南省浏阳市金塘村为例[J]. 学术论坛, 2010(8): 130-133.
- [19] 陈涛, 谢家彪. 混合型抗争——当前农民环境抗争的一个解释框架[J]. 社会学研究, 2016(3): 25-46.
- [20] 周晓光. 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地理研究[M].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6.
- [21] 谷家荣. 坳瑶社会变迁: 广西金秀大瑶山下古陈村调查[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
- [22] 李友梅, 肖瑛, 黄晓春. 社会认同: 一种结构视野的分析——以美、德、日三国为例[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23] 黄立敏. 社会资本视阈下的“村改居”社区治理研究——以深圳市宝安区为例[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
- [24] 钱杭. 宗族的传统建构与现代转型[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 [25] 夏光, 李丽平, 高颖楠, 等. 国外生态环境保护经验与启示[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 [26] 汪国华. 大共同体与差序格局互构: 我国农村点源污染治理困境研究[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29(1): 45-50.

(责任编辑: 高虹)